

ZHEJIANG CHRONOLOGICAL PORCELAIN

浙江
纪年
瓷

浙江省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浙江纪年瓷

Zhejiang Chronological Porcelain

浙江省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

封面题签 汪庆正
封面设计 周小玮
摄影 郑旭明
高 玲
图版说明 韩经世等
英文翻译 黄乔生
版面设计 姚敏苏
责任编辑
责任印制 王少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浙江纪年瓷/浙江省博物馆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0.9

ISBN 7-5010-1217-2

I. 浙… II. 浙… III. 瓷器(考古) — 浙江
IV. K87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0539 号

浙江纪年瓷

浙江省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5

2000 年 9 月第一版 200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217-2/K·504 定价: 180 元

2000. 11. 7

考古书店

浙江纪年瓷

Zhejiang Chronological Porcelain

目 录

前言	3
浙江出土纪年瓷概述	汤苏婴 5
英文提要	16
图版目录	19
英文图版目录	26
图版	35

目 录

前言	3
浙江出土纪年瓷概述	汤苏婴 5
英文提要	16
图版目录	19
英文图版目录	26
图版	35

前 言

浙江是我国瓷器的发源地和青瓷的主要产地，迄今已发现古窑址近二千处，从而构成了上起商周、下至清代的庞大瓷窑体系。自东汉成熟瓷器创烧后，制瓷业发展迅速，在长达一千五百余年的瓷业史中，出现了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龙泉窑、南宋官窑等著名窑口，对全国其他地区的制瓷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世界“东方陶瓷热”不断升温的今天，研究、喜爱浙江古代瓷器的人与日俱增。然而，无论从历史研究、科学借鉴还是艺术欣赏的角度，正确推断瓷器的年代是一个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有明确纪年的墓葬出土的瓷器，以及刻有年号的瓷器，正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断代的依据和科学鉴定的标尺。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没有一本系统、可靠、可资参考的浙江古代纪年瓷图录，使得研究和鉴赏浙江古代瓷器者颇感不便。有鉴于此，本馆决定编辑这本《浙江纪年瓷》图录。这不仅是我馆老一辈陶瓷考古学者的希望，也是新一代陶瓷研究工作者的责任。春去秋来，历经寒暑，现在终于将这本图录奉献在各位读者面前。

本图录由韩经世、汤苏婴共同主编，《概述》由汤苏婴执笔，器物说明除部分由地县同志供稿，均由韩经世撰写。照片由郑旭明、高玲拍摄。本图录在编辑、拍摄过程中得到浙江省文物局及全省有关兄弟博物馆的大力支持，文物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古陶瓷的研究者、爱好者提供一本有用的工具书。

浙江省博物馆

1999年2月

浙江出土纪年瓷概述

汤 苏 婴

纪年瓷，顾名思义，指有明确纪年的瓷器，它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分。狭义的纪年瓷指的是在器身上刻有纪年铭文，表明这件瓷器制作的绝对年代。这类纪年有的精确到年月日。所谓广义的纪年瓷，器物本身不一定都有纪年铭文，但可利用科学的考古手段，通过墓葬、窖藏、遗址等古代遗存中有确切纪年的遗物如墓砖、墓志等来判断瓷器制作时间的下限，表现的多是瓷器的相对年代。后者的数量远远超过前者。

浙江是中国古代青瓷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区。浙江瓷器滥觞于商代，终迄于清，在绵延几千年的烧造历史中，出现了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龙泉窑和南宋官窑等著名的窑口，并形成了一些窑系，对全国的制瓷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有关青瓷的记载很多，晋代潘岳《笙赋》中“披黄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醪”的描写，首次记录了“缥瓷”一说；唐代陆龟蒙《秘色越器》中“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是目前所见“越窑”之名的最早记载，同时留下了“秘色”之迷。宋及以后的正史杂记中，有辗转抄录的史料，有收藏鉴赏的辑录。明代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述了龙泉境内瓷业生产的工艺流程，而同时期的方志也载有当地关于“哥窑”、“弟窑”的传说。从20世纪30年代起，以陈万里先生为代表的古陶瓷研究学者走出书斋，把陶瓷研究与田野考古结合起来，对浙江的古窑址进行实地考察，著有《越瓷图录》等书，使古陶瓷研究方法有了质的突破。近五十年来，浙江考古工作者把古陶瓷的研究纳入中国考古学的范畴，对浙江境内的古代窑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有重点的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迄今已发现各时代窑址约二千余处。由密布的窑场和丰厚的堆积，可以想象浙江古代瓷业的繁盛。从省内、全国乃至海外，大量的墓葬、窖藏、沉船、城址等古代遗存中，出土浙江境内各时代、各窑口烧制的产品，更是不计其数。然而，无论进行科学研究还是艺术鉴赏，正确判断瓷器年代是首要的问题，纪年瓷无疑是最好的实物资料。

浙江出土的纪年瓷，绝大部分出自遍布全省各地的纪年墓葬。在浙江发掘的历代纪年墓中，六朝时期的纪年主要见于墓砖铭，唐以后则为墓志铭。随着各个时期纪年墓数量的多少、墓葬规格的大小，特别是随着历代经济、社会、葬俗等方面的变迁，纪年墓出土的随葬瓷器种类、数量及内涵也在不断变化。本图录收集的是从这些纪年墓和有纪年的塔内出土的瓷器，以及有纪年刻铭的瓷器。它们都可以判定是浙江境内不同时期各

窑口的产品。我们将其按照纪年顺序进行编排,并将同一个时代、不同窑口的器物品种,系统地集中在一起。通过这些瓷器的相互比较,可以全方位、多层次地了解浙江古代瓷业,不仅在器物断代上可以依此类推,而且对同类产品的窑口归属,也具有参考作用。

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的浙江,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物产丰饶,早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就有了发达的耕作农业;四千年前的良渚文化,以其精美绝伦的玉器让世人叹为观止。它们特有的黑皮陶,也以胎体匀薄,造型端巧而独具一格。瓷与陶从原料到烧成温度有本质区别。瓷出现在商代,它用瓷土做坯,外施青釉,烧成温度达1200℃,是成熟青瓷在原始阶段的产品,一般称为原始青瓷。在浙江西周的土墩墓中出土的原始青瓷,特点为胎质粗疏,釉色青褐,釉质凝结,常见一种附加的S形纹粘贴在豆、罐等器物上。春秋战国时期,目前在杭嘉湖平原的德清、萧山和绍兴等地区发现了许多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合烧的窑址,瓷器与前期相比有所变化,釉色发黄,出现了碗、杯、盅等小型器,其中的杯直口、筒腹、平底,大小规格齐全,器底有粗螺旋纹的轮制痕迹。标志这一时期制瓷水平的是模仿青铜礼器的产品,种类有鼎、尊、卣、盃、钟、编钟等,制作规整,纹饰精美,此类器物在德清皇坟山成组出土,说明这一阶段的原始瓷生产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但由于越国的灭亡而迅速减少甚至停产。西汉时期到东汉早中期,从墓葬出土的器皿看,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随葬品组合以仿铜礼器的鼎、盒、壶、甗、钟、钲等陶器为主,西汉晚期演变为壶、甗、罐为主。这是一种胎为褐色,施茶绿色釉,刻划云气纹的高温釉陶。东汉中期以后,原始瓷的数量逐步增加。目前发现最早有随葬青瓷的是奉化东汉熹平四年(175年)墓,出土了五件青瓷,有井、耳杯、灶、熏炉、五联罐。这些瓷器继承发展了早期原始青瓷和高温釉陶的工艺传统,胎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上虞小仙坛东汉窑址标本测定的数据看,此时青瓷胎釉的化学成分和烧结程度已臻成熟。透过墓葬出土的成组器物 and 窑址采集的标本综合考察,东汉成熟瓷器的种类、造型和纹饰特征,如井、灶、五联罐和几何纹样,都可以在原始瓷中找到相类似的器物,从而可以看出它们的演变轨迹。

六朝墓葬是浙江常见的古代遗存,遍布全省各地,从20世纪50年代起,为配合各种基本建设,文物考古工作者抢救性发掘了数以千计的墓葬,其中大规模的发掘有黄岩秀岭水库,瑞安桐溪、芦蒲水库,淳安新安江水库,诸暨牌头、金华竹马等地的墓葬群,以及上虞、嵊州、新昌等地零星的发掘。这些大量的墓葬中,有纪年的只占少数。六朝时期的墓葬,墓室用砖砌成,在一些砖的侧面模印图案和文字,其中就有纪年铭文。三国时期的纪年墓,以嵊州、上虞两地最多,随葬品百分之九十用青瓷。嵊州永安六年(263年)墓出土的青瓷产品质量高,种类多。上虞江山乡天纪元年(272年)墓出土的几件青瓷,反映了这一时期青瓷的烧造形成了一定规模。当时江南一带社会相对稳定,生活富庶,厚葬之风盛行。这种风尚延至整个西晋时期,但也有地区差异。如黄岩秀岭天玺元

年(276年)墓,只出三足盆一件,瓷碟两件,釉色黄而剥落严重,这与当地的瓷业状况有关。浙江境内的西晋墓数量最多,纪年墓的数量相对也多,其中以太康、元康年间的纪年墓较为集中。唐人杜佑《通典》中引用晋贺循《葬经》关于随葬品的叙述:“神位既定,乃下器圹中,其明器……瓦香炉一、釜二、枕一、瓦烛盘一……”文中的“瓦”当指陶瓷器。可能由于浙江境内的墓葬大都为中小型之故,青瓷随葬品似乎没有一定的组合规律可循。常见的出土器物有罐、壶、钵、碗、洗、盆、碟、耳杯、唾盂、水盂、熏炉、虎子、砚、槲等,明器有堆塑罐、灶、水井、猪圈、狗圈、鸡舍、火盆、熊斗等。同一类型的罐、钵有时一墓同出几件。大量使用瓷器的葬俗,反映了瓷业生产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和扩大。绍兴永嘉七年(313年)墓共出土青瓷器十七件,是西晋时期中型墓较为典型的器物组合,其中一类是日常生活用具,如罐、壶、钵等;一类是明器,有一件堆塑罐,还有筛、碾等模型。器物制作规整,胎釉特征统一,特别是在一件火盆底部刻有“徐龙”二字,是这个时期的器物上少见的人物名款(图版80-2)。从设计和质量看,这组器物可能是特为墓主人订烧的随葬品。东晋早期器物依然保留了西晋时期的特点,如出土于萧山永昌元年(322年)墓的堆塑罐、猪圈等明器。东晋中晚期,随葬青瓷的数量和种类有所减少,随葬品一般在十件左右,随葬品的组合,大都为日常生活用品,明器已不见。各地墓葬随葬瓷器的面貌区别明显,杭州老和山兴宁二年(364年)墓出土的是黑瓷,温州永嘉永和十年(354年)墓、升平三年(359年)墓出土的是淡青釉饰满褐彩的产品,反映了浙江各地瓷业生产的面貌。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往往是六朝墓葬群中出土瓷器数量最少的,随葬的瓷器一般只有四五件,多是一些罐、壶、盘之类器物,其中瑞安梁天监九年(510年)墓出土的青瓷最丰富,也最精美。

六朝纪年墓的资料十分丰富,根据这些出土器物的造型特点和装饰变化进行排比,基本可以分为四个大的时期。

第一期,三国——东晋早期。这一时期,孙吴在江东立国,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制瓷业作为一种新兴的手工业,展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景象,以上虞为中心的早期越窑,它的成型工艺和烧制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其胎釉特征一直延续到六朝终结,其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变化的只是器物的造型和装饰纹样,这也是早期越窑青瓷发展的特点。因此,从三国到东晋早期,往往是器皿和雕塑一体化,如盛行的堆塑罐,在罐体上有亭阁楼阙等建筑、舞蹈奏乐的倡伎优伶、飞禽走兽及佛像的形象,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制作手段随意化,很少有统一规格或相同式样。这种制作手法,同样表现在取之于生活场景的明器类如猪栏、鸡舍、狗圈等,它们都表现得粗率拙朴。动物形象的各类器皿,又是这一时期器物造型的显著特征,大量出现有羊形器、狮形器、蛙盂、兔盂、鸟形杯、虎子等。江苏境内出土的神兽尊、鹰形罐、熊形灯盏等一些精品,同样构思奇巧,刻划细致,把羊的温驯、狮虎的威猛、蛙的灵敏等刻划得气韵生动,形神

兼备，在写实的基础上兼顾实用功能。这些采用雕塑手法制作的青瓷产品在当时的盛行，并非仅限于对美的追求，更多表现的是这一时期人们对所仰慕的精神世界的向往。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汉末大乱，儒家思想逐渐失去了统治地位，传统的道教、玄学发展起来，外来的佛教文化又在逐渐渗入。这个时期不仅器物上装饰了大量鸟的形象，而且几乎所有动物，甚至连猪圈模型里的猪都刻划了双翼（图版14）。沈约《赤松涧诗》云：“愿受全液方，片言生羽翼。”淮南王刘安《八公操》写道：“公将与予生毛羽兮，超腾青云蹈梁甫兮。”这些都反映出当时仙化得道思想的流行。在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上，讲究局部装饰也是这一时期的特征：在器耳上刻划有叶脉纹；器足形式多样，有兽足、蹄足、熊形足，出土于杭州太安二年（303年）墓的青瓷三足砚则是力士足（图版69）。而装饰在器物上的纹样，则表现出程式规范，繁简有序。斜方格网纹、联珠纹、水波纹、菱形纹、花蕊纹，有的单独使用，更多的是组成饰带。与早期越窑胎釉特征相结合，整件器形具有富丽华贵而又庄重厚实的风格特征。这一时期的许多器物造型和纹样可以看出是从其他手工艺品中移植和借鉴的，如在器腹上贴饰铺首衔环。这一时期又出现了佛像。然而对嵊州永安六年（263年）墓出土的樽（图版12）的装饰布局分析，佛像在这一时期出现在器腹上，并没有多少宗教内涵，而更多是作为一种新的装饰题材。

从这一时期墓葬出土的纪年瓷可以看到，有些器物存在阶段性的变化，如堆塑罐就是从东汉时期的五联罐演变而来的。出土于东汉熹平四年墓的五联罐，全器作葫芦形，束腰部分尚残留了堆塑的人物和鸟兽，有四个对称的圆孔，这种罐三国时演变为一种既有罐，又堆塑简单的建筑、人物、佛像、飞禽走兽的造型，器腹仍保留有圆孔（图版4）。这类器物以西晋太康、元康年间墓葬出土的最为集中，堆塑的内容也最繁复，形制大同小异。萧山东晋永昌元年（322年）墓出土的堆塑罐（图版90）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晚的，形制已趋简化。堆塑罐的造型，经过了一个简单——复杂——简单的演化过程。江苏南京吴墓曾出土一件铭文为“甘露元年五月造”的油灯，灯柱为蹲熊造型，坐于承盘内，头顶及前肢顶托起油盏。吴兴西晋永康元年（300年）墓出土的灯盏（图版62），造型简洁大方，底部的圈足较为少见，也是由繁到简的例证。嵊州吴永安六年墓出土的圆桶（图版13），表明圆桶三国时期已出现，改变了过去认为早期只有方桶，至东晋演变成圆桶的过程。嵊州元康八年墓出土的熏炉（图版52），顶部有卧鸟，器身如球形，有三层锯齿三角形镂孔，下有兽足底盘，与江苏宜兴西晋元康七年周处墓出土的熏炉相同，只是周处墓的一件熏炉孔为三角形。这些精雕细镂的高档品，应该是专为上层社会制造的，它与器身如罐、器壁镂多重圆孔、口沿处有二竖耳的熏炉，并无演变关系，后者目前所见最早出土于嵊州吴太平二年（257年），（图版5）到东晋永昌元年（322年）墓（图版91），其间形制没有多大的改变。另有一个问题，有些同一种类的器物之间的差异，应是形制

不同，而不存在演变关系。如虎子，有虎形和圆形之分，在温州弥陀山西晋永宁二年墓，两种类型共存。蛙形水盂和圆形水盂也同样如此。这些产品或许是种类相似而用途不同，或许是为适应不同层面的消费者而生产的。

这一时期，以上虞为中心的早期越窑，它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当时南方政治、经济中心的建康（今江苏南京）。近五十年来，南京这一时期墓葬大量出土了越窑产品。它们不仅数量多，而且制作精。有些器物刻有“上虞”二字。同时，在浙江其他地区也有不同规模的瓷业产区，从墓葬出土的纪年瓷看，当时温州地区的瓯窑、金华地区的婺州窑，从产品种类、造型特点到器物组合，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与越窑的区别，主要在因瓷土原料不同而表现出来的胎釉差异。因此，无论生产的规模还是产品的质量都无法与越窑相提并论。

第二期，东晋中晚期。这一时期，各地墓葬随葬青瓷的数量有所减少，但产品明显地表现出不同的地域风格，说明浙江各地的瓷业格局有了新的变化，越窑的产品中已不见明器，日用器物种类也有所减少，主要为罐、壶、钵类，纹饰简化。据窑址的考古调查，这一时期的窑场数量骤减。与此相反，温州地区的瓯窑和杭嘉湖平原的德清窑相继崛起，从生产的品种看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东晋杜毓《荈赋》中提到：“器择陶拣，出自东瓯。”清蓝浦《景德镇陶录》也说：“瓯，越也，昔属闽地，今为浙江温州府，自晋已陶，当时著尚。”出土的纪年瓷正是当时瓯窑生产的真实写照。瓯窑器物造型并未因循当时影响甚广的越窑，而是生产出许多别具一格的器物种类，有轻巧雅致的小尊、小罐、小钵，有实用的盖罐、盖盒，有妙趣横生的牛形灯盏（图版115）。这些造型和装饰的巧妙结合，构成了瓯窑器物的造型特点。由于当地瓷土的含铁量低，瓯窑器物的胎釉特征与越窑不同，胎为灰白色，釉色淡青，色泽匀净滋润，玻质感强，利用这种特性，把褐彩这种在三国时已出现的装饰手法，以更为新颖独特的形式运用到器物的口、肩、腹、盖面等醒目的位置，将圆点、斑块或条纹根据器物的造型进行排列装饰，形成了千变万化的图案，开拓了陶瓷装饰艺术的新领域。然而，瓯窑器物的釉面有许多细碎冰裂纹，胎釉结合不好，容易剥落，说明当时的烧制技术尚有缺陷。

早期瓯窑是一处有争议的窑口，从文献考证到窑址考古调查，众说纷纭。以往的古陶瓷学者常引用西晋潘岳《笙赋》中“倾缥瓷以酌酃”的“缥瓷”一说来形容瓯窑瓷器的釉色。但据史料记载，潘岳生活在西晋武帝、惠帝时期（3世纪末4世纪初），距离瓯窑兴盛的东晋中期尚相差五十余年时间。“缥瓷”一词，恐怕更应属于文学修饰。如果《笙赋》中谈到的瓷器有具体所指，根据对当时瓷业生产状况的考古调查，当指早期越窑全盛阶段的产品。而到了东晋中期以后情况则有很大改观。据浙江纪年墓出土的瓷器资料，结合江苏南京地区东晋中晚期随葬瓷器中大量的瓯窑产品，特别是一些世家大族墓出土的瓯窑精品，与同时期的越窑比较，这一阶段瓯窑的影响大大超过了越窑。同时，与这

些瓯窑产品同墓共出的还有黑瓷，这是这一时期兴起的另一个窑口德清窑的产品。

德清窑位于杭嘉湖平原，现已发现，早在商周时期，就有原始瓷窑址，东晋时期是青瓷、黑瓷合烧的窑场。青瓷烧成后，胎呈紫褐色，釉色青绿，因此事先需使用化妆土工艺进行美化。正是由于这种原料上的先天不足，窑工们对工艺大胆革新，创造性地发明了一个新的瓷器品种。应该说，黑瓷的生产不是德清窑的首创，据对宁绍平原东汉窑址的调查中发现，此时也有黑瓷出现，但这是由于对原料中的含铁量控制不佳无意中产生的，这种黑瓷处于从属地位，在产品种类和造型上与同窑合烧的青瓷相同。德清窑的黑瓷，表面釉层匀净，漆黑光亮，造型饱满端正。出土于杭州兴宁二年墓的器物组合中，熏炉、托盏、带盖小罐、盖盒，都是独具风格的器物品类。

东晋中晚期，尽管各个窑口从产品种类、装饰工艺到造型特点都各有千秋，但由于相邻的地域、同时代的习俗，在瓷器上又呈现出一些共性。最能表现这一时期时代特征的器物就是鸡首壶。鸡首壶各窑都有生产，早期的其他产品往往存在由繁到简的过程，只有鸡首壶反其道而行之。鸡首、鸡尾从早期的纯装饰物，变为鸡首雕琢成与器腹相通的流，鸡尾成为粗大的把手，与昂起的鸡首相呼应；器腹丰满敦实，并安有桥形系，形成和谐的整体。这一时期器物的实用功能增强，如出现大量的带盖器。如果说前期的青瓷制品主要的功用是为了随葬，这一时期则更多是根据生活中的实际需求设计制作的。

第三期，刘宋时期。这是一个过渡阶段，开始出现连瓣装饰，龙柄鸡首壶大量出现，碗类腹壁加深。

第四期，齐、梁、陈时期。随着佛教的盛行，佛门圣花莲花成为各窑普遍使用的装饰图案，用深刻或浅划两种手法，将或仰或覆的莲花瓣装饰在不同造型的器物上。瑞安梁天监九年墓出土的一对莲花罐（图版148、149）在相同的器形上，展示了两种不同手法的装饰效果。越窑的莲瓣纹以浅划手法为主，而瓯窑罐类器物上一般都采用深刻的手法。

六朝时期，这些时代相同，地域又相邻的各窑口，它们的产品，既有独具风格的地方特色，又有许多时代的共性。共性和个性的交织，构成了浙江早期瓷业生产绚丽多姿的面貌。

唐、五代纪年墓葬出土的瓷器和刻铭纪年瓷资料十分丰富，如兰溪永徽二年（651年）墓出土的青瓷四系罐、诸暨贞元十年（794年）墓出土的青瓷玉璧底碗。器物规格最高、出土数量最多的是分布在杭州、临安两地的吴越国国王钱氏家族墓。吴越国是十国中的一国，定都杭州。现已发掘的天复元年（901年）水邱氏墓、天福四年（939年）康陵、天福七年（942年）钱元瓘墓，出土了大批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青瓷珍品。其中少量自铭为“甌”的器物刻有年号。

唐朝是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经过初唐的贞观之治，迎来了盛唐的开元盛世，出

现了经济上的繁荣，各类手工业都有了蓬勃的发展。瓷业生产中，北方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产品异军突起，与历史悠久的越窑青瓷分庭抗礼，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而越窑经过隋至初唐短暂的沉寂，迎来了浙江青瓷史上空前的发展。装烧工艺上匣钵的使用，让青瓷真正发挥了釉的色泽和质地之美。以玉璧底碗（图版160）和印有“大中二年”（848年）铭文的云鹤纹碗（图版166）为代表的一批制品，以完全不同于早期越窑的胎釉特征，及根据实用需要和审美观念的变化而创新的器物造型，标志着越窑的技术和艺术水平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窑址考古调查表明，此时越窑的烧造中心已移至慈溪上林湖一带。当时盛行一种随葬用的青瓷墓志罐，在形同直口罐的器腹上刻写竖行墓志铭，这类器物成为陶瓷史研究难得的实物资料。青瓷墓志罐的纪年目前所见最早是唐会昌二年（842年），最晚为龙德二年（922年）。其中唐光启三年（887年）墓志罐（图版170）刻铭中“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三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的记载最具史料价值。铭文明确提到了贡窑的存在。贡窑是历史上一种特有的陶政制度，它出现的时间、生产的形式目前尚未考察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生产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工匠，烧造的是代表了当时最高制瓷工艺的产品。唐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中吟咏道：“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剡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滨。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诗中描写的正是出自贡窑的秘色瓷。秘色瓷一直是困扰着历代古陶瓷研究者的一个谜团。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特别是1987年陕西法门寺唐代塔基地宫出土了有伴出物账记录为“瓷秘色”的青釉瓶、碗、盘、碟等器，秘色瓷的神秘面纱才被揭开。如今古陶瓷研究者对秘色瓷的性质基本上达成共识：它不一定都在贡窑中烧成，而是时人对唐宋越窑青瓷精品的一种称谓。

根据出土的纪年瓷资料，唐、五代瓷器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以贞元十年墓为代表。这个时期，饮茶之风兴盛，各窑口间的产品互相效仿，饮茶用的玉璧底碗在许多的青瓷和白瓷窑口都有生产。此时的越窑产品尚未形成自己的特点。

第二阶段，以宁波和义路出土印有“大中二年”铭文的印花碗为代表。与此同一地层出土的还有带托茶盏、海棠杯、瓜棱执壶等。这一时期的制品釉色以青黄居多，质地莹润光亮，在一些碗、盘内刻划疏朗的花草纹。总的特点是以造型取胜，虽然是一些日常生活用具，但是形体丰盈、线条简洁，体现出大唐艺术的风范。

出土于天复元年（901年）水邱氏墓的大批青瓷，其中三件大型器物油灯、香炉、盖罍制作精细，气势恢宏，釉下所绘褐彩如意云纹布局严谨，技法娴熟。同时出土的碗呈五瓣花形，是这一时期越窑流行的式样。而从釉色观察，这组随葬的青瓷呈色似乎不稳定，有灰青略闪黄的，有黄绿的，也有青灰色的，说明这一时期的瓷器烧制对窑内火焰和还原气氛的控制尚有欠缺。

五代吴越国建立，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发展经济，为了偏安江南一隅，竭力贡奉中原各国，其中青瓷是重要的贡品，《十国春秋》等文献中对此有所记载。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越窑青瓷的发展。葬于天福四年（939年）的康陵、天福七年（942年）的钱元瓘墓出土的大批青瓷，釉色、造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器物种类增多，有碗、盏、盏托、粉盒、盘、委角方盒等，器壁轻薄，釉色统一，均呈青绿色，色泽典雅含蓄。由于采用了裹足支烧的方法，造型上形成了轻盈秀巧的风格，多见花口和葵口，圈足外撇。钱元瓘墓出土的肩腹浮雕双龙纹的青瓷罍（图版192）、浅划花卉纹执壶（图版195），也标志着越窑产品风格的转变。

许多有纪年的北宋墓葬中，均发现只随葬外省瓷窑生产的精美青白瓷，而少见浙江青瓷，这应该是某种社会背景在墓葬中的反映。随葬本地烧制的青瓷，往往是一些特制的随葬明器，如龙泉元丰元年（1078年）墓所出的青瓷五管瓶，武义元丰六年（1083年）墓所出的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黑釉堆塑罐等。南宋墓葬青瓷随葬品的数量增加，但品种比较单调，往往只有一、二件碗瓶类产品。

北宋初年有确切纪年的越窑产品，在浙江目前只有出自黄岩灵石寺塔的青瓷熏炉（图版198），它造型端巧玲珑，熏盖上装饰着婉转流畅、疏落有致的镂空图案，再配以莹润透澈的青绿釉色，集中展示了越窑鼎盛时期的艺术风貌。这一时期产品的种类大大增加，其造型延续了五代时期精细雅致的特点，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装饰上，用纤细的线条，娴熟细腻的技巧，把题材丰富的纹样装点各类器皿上，将陶瓷的装饰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熏炉圈足使用的粘接法，也是这一时期制作工艺上的创新，它使青瓷造型更加纤巧轻盈，可以和同时代的金银器造型相媲美。据考古资料表明，越窑烧造的地域也更为广泛，不局限在慈溪上林湖一带，鄞县、绍兴、上虞、临海等地都有规模可观的窑群，越窑由此而形成庞大的窑系，以满足海内外市场的需求。刻有“嘉祐八年”（1063年）铭文的青瓷砚（图版199），胎色青灰，细腻致密，釉色青绿匀净，与北宋初年的胎釉毫无二致，说明这个时期越窑仍保持一定的烧造水平。而唐宋时期的瓯窑、婺州窑等窑口，器物种类和演变规律与越窑基本一致。但由于政治、经济上的原因及自身瓷土原料的制约，其规模和产品质量都无法与越窑抗衡，但仍有一些产品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如黑釉堆塑龙纹盖罐（图版203）；也有一些令人瞩目的精品，如青瓷观音坐像（图版205）。

有宋一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瓷器作为大宗商品，海内外市场需求骤增，全国的瓷业呈现了南北交融、名窑林立的局面。地处浙南山区的龙泉，在原料、燃料、水源、交通等方面提供了有利于制瓷业发展的自然环境。龙泉窑的创烧，就基于这样的背景。龙泉窑最初阶段的产品，白胎、淡青釉、装饰刻划花，类似瓯窑的产品。但除了胎釉特征，纤细的刻划花、施满釉的裹足、垫圈支烧的方法，都是北宋初年浙江瓷业共有的工艺特征，因此这类产品的出现，是一种烧制技术和产品的直接传播，使龙泉窑在烧造伊始就